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屈原集校注

上册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屈原集校注

上冊

金開誠
董洪利 著
高路明

中華書局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屈原集校注

下冊

金開誠
董洪利 著
高路明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屈原集校注/金開誠等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 1996.8
(1999重印)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7-101-01316-3

I.屈… II.金… III.屈原-楚辭-注釋 IV.I222.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98)第07141號

責任編輯:戴燕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屈原集校注

(全二冊)

金開誠 董洪利 高路明 著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 100073)

北京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毫米1/32·25¹/4印張·528千字

1996年8月第1版 1999年11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數 5001—8000 冊 定價: 38.00 元

ISBN 7-101-01316-3/I·204

本書出版得到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資助

前言

一

「楚辭」之名，最早見於史記酷吏列傳張湯傳：

……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

史記是西漢前期的文獻，「楚辭」之名當早於史記而出現，但再早也不會早於漢初。因爲就漢以前的情況而論，秦代是沒有也不可能有人傳誦楚辭的。因秦本是敵國，司馬遷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可見仇恨之深。楚辭的主要作者屈原又是力主抗秦的政治家，所以秦代統治者不會讓楚辭在秦流行。至於戰國時的楚人，則因本在楚地，也似無贅言「楚辭」之理，大概只稱具有本地特色的詩體爲「辭」。史記屈原列傳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班固離騷贊序解釋離騷篇名時說：「離，猶遭也；騷，憂也。明己遭憂作辭也。」又說：「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悼悲，故傳於後。」這些記載所說的「辭」，當是楚國當年固有的稱謂。到了漢代雖然仍有人沿而稱之，但在統一的王朝中，由於有趙、代、秦、楚之「謳」並存，於是就把特產於楚的「辭」稱爲「楚辭」，以標明它

的地域特色。因此，所謂「楚辭」，按其本義來說就是楚人的歌辭。宋人黃伯思解釋楚辭之名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物，故可謂之楚辭。」東觀餘論校定楚辭序這個解釋是正確的。「楚辭」就是用楚國方言按照獨特的語言方式寫作，富有濃鬱的楚地色彩和風情，並且能够用楚國音樂誦唱的一種新的詩體。

楚辭這種詩體最早是在民間產生的。楚人素以能歌善舞著稱，很早就有民歌流傳。例如詩經的周南召南兩部分中，就有一些是採自楚地的詩歌。據劉向說苑記載，早在公元前六世紀中葉，楚國就出現了一首根據越人土語翻譯出來的詩歌，即著名的越人歌：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見說苑善說篇，首句「舟」字據玉臺新詠改。

稍後數十年，又出現了孟子離婁所引，傳為孔子所聞的孺子歌：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再有就是現在保留在楚辭一書中的九歌，它雖並非用於民間祭祀，却與楚國的民間祭歌有關係（特別是在樂曲上）。民間祭歌始於何時當然無法考知，今傳的九歌肯定經過屈原的修改和加工，但加工大概主要是在內容和詞藻上，變動句式的可能性較小。因為這牽涉到所配樂曲，假如變化很大，就會增加巫者演唱的困難。

從周南召南到九歌，可以約略看出楚國民歌發展的一條綫索。偉大詩人屈原就是在學習和接受

楚國民歌的基礎上，發展了楚辭這一有濃重地方色彩的新詩體，並以其光輝的創作奠定了楚辭的典型形式。概括說來，作為一種新詩體的楚辭，其主要特徵有以下各點。

(一) 句式。傳統的詩經體以四字句為典型句式，句中是「二二」節奏。例如：

關關／雉鳩，／在河／之洲。

《周南·關雎》

楚辭的典型句式有六字句和五字句兩種（都不算語氣詞「兮」），句中分別為「三三」和「三二」節奏，前者主要見於離騷、九章，後者主要見於九歌。例如：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離騷》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嘆乎／增傷。

《九章·抽思》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

《九歌·湘君》

所以從詩經到楚辭，詩歌的典型句式發生了變化，變得更有表現力了。除了典型句式之外，詩經和楚辭中都有許多長短不齊的句子；而一般來說，楚辭中穿插這種句子更加靈活多變。

(二) 語氣詞「兮」的運用。在詩經的一些詩中，也出現過「兮」字，但數量不多，不像楚辭那樣，運用「兮」字不但普遍而且帶有規律性，因而竟成為語言形式上一個顯著的特徵。

楚辭的形式起源於民歌，所以語氣詞的運用是重要的。試想現在歌曲中的「啊」、「呀」之類的詞，雖然作為歌詞看沒有多大意義，但在歌唱中加上了裝飾音，却在歌曲旋律中變得相當重要。由此就可以推想「兮」字的運用在楚辭形式構成中的作用。又「兮」字在句中的位置變化，必然影響歌唱或吟誦

的氣口與節奏，由此又可以推想，以「兮」爲基點，其兩端的字數如果較少，則這些字的發音用調必然悠長而近於歌唱；反之，兩端字數如果較多，則這些字的發音用調必然短促而近於吟誦。從實際情況來驗證，九歌是祀神的樂歌，必然要唱，而其句中「兮」的兩端只有三字或二字。至於離騷，則因篇幅過長，必不能唱，而其典型句式的「兮」字兩端却各有六個字，後來漢人的擬騷之作也不能唱，而其句式亦如離騷。這都證實了上述的推想。由此可見，「兮」字在句中位置的變化，也正顯示了楚辭由樂歌形式到吟誦形式的發展演變。

(三) 地方色彩。楚辭的地方特色給人以較深印象的主要有兩點：一是由「楚地」、「楚物」形象所構成的完形畫面，確是反映了富有地方特色的山川景物，風土人情，使人感到江漢流域的壯麗景色、繁富物類以及深受巫風影響的楚國文化都確有濃艷的色彩，特異的風情，與傳統的詩三百篇所着重反映的北方地理環境和文化背景相比，顯然給人以不同的觀感。一是用「楚語」、「楚聲」所作的歌唱或吟誦也很有特色。這一點現在除了從用詞上得到一些感受外，當然已無法通過聽覺來直接驗證，但從歷史記載看，漢書禮樂志說：「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漢高祖喜愛楚聲的事例非一，可見其必有動聽之處。又史記項羽本紀寫項羽被圍垓下，「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羽雖然被圍，但圍軍與項羽所在之處總有相當大的距離，隔了這麼遠而項羽一聽便知爲楚歌，可見楚歌的特點是多麼突出！

由此可見，楚辭的地方色彩無論就視覺或聽覺上說，都是文學創作上的一種鮮明特色，而且這種

特色是有積極的美學意義的。

二

「楚辭」一詞在作爲一種詩體名稱的同時，也曾用來指以屈原爲主的一些楚國辭人的作品。這些作品曾因秦國滅楚而中斷流傳，那麼它們爲何又能在漢代重新出現於世呢？

漢代班固在離騷贊序中說，屈原痛君不明，國將危亡，故作離騷，九章以諷諫，卒不見納，自投汨羅，「原死之後，秦果滅楚，其辭爲衆賢所悲悼，故傳於後。」又王逸在楚辭章句離騷後序中說：「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這些話都說明漢人對屈原辭流傳的可靠性是毫不懷疑的，同時他們分析屈原辭得以流傳的原因也是有道理的。但他們並未詳說流傳的具體情況，所以在這方面還要作一些補充論述。

屈原在九章抽思中說「結微情以陳詞令，矯以遺夫美人」，說明他的有些辭作本爲「獻詩陳志」而作，並不限於個人抒發感情。史記屈原列傳說屈原「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下面又說「令尹子蘭聞之大怒」。這一事實也說明屈原辭雖多有違礙之言，但在當時却並不保密，而是在社會上有所流傳的。又屈原列傳說：「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這進一步證明了屈原辭流傳的社會性。可以想見，屈原在楚國人士中的影響是不小的，至於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辭作者，既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當然更會致

力於屈原的收集、整理、保管和傳習。另外，還應充分估計到屈原辭通過民間渠道流傳於後世的可能性。屈原的辭作中充滿了關心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的思想感情，他本人最後以身殉國，而他對國事所懷的憂慮後來也都爲事實所驗證，這一切都必然受到廣大楚國人的尊敬與同情。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說：「屈原以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死，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梁宗懷荆楚歲時記也說：「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並命舟揖以拯之。」這些雖是後人所追記，但都以代代相傳的傳說與民俗爲根據，可以看出楚人對屈原的敬愛與懷念。在這樣的民心趨向中，屈原辭在民間受到重視、保存和流傳是勢所必然的。事實上屈原在流放期間所作的辭（如天問、哀郢、涉江、懷沙等），倘若不經民間的渠道，也是決不能流傳於後世的。

但是，屈原辭的流傳畢竟曾因秦滅楚國而嚴重受阻以至於有所埋沒，所以到了漢初又經過一番蒐集發掘才得以重見於世。

漢書地理志下說：

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皆以顯名。漢興，高祖王兄子濞於吳，招致天下之娛游子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都壽春，招賓客著書。而吳有嚴助、朱買臣，貴顯漢朝，文辭並發，故世傳楚辭。

這段記述雖然簡略而且條理不清，但也已揭示了楚辭發掘與傳揚的兩條線索：

第一是吳王諸士與楚辭的密切關係，其中枚乘卽是漢賦作者中的先驅人物，無論從辭與賦在文體

上的緊密聯繫來看，或從他的代表作七發來看，都可以肯定枚乘是深受過楚辭影響的。又，嚴夫子即莊忌（莊）因避漢明帝諱改「嚴」，也就是楚辭中哀時命一篇的作者，他的兒子即莊助，史記酷吏列傳說他曾薦朱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可見莊忌、莊助父子相傳，都是精通楚辭的。另外，把莊忌的哀時命與楚辭各篇加以比較，可以從相同和近似的詞句中看出遠遊、九辯、離騷以及九章部分篇章對莊忌的影響，從而也可以使人大致想見吳王諸士在吳地蒐集楚辭的收獲。

第二是淮南王劉安及其門下之士與楚辭的密切關係。王逸楚辭章句招隱士序說：「昔淮南王安博雅好古，招懷天下俊偉之士，自八公之徒咸慕其德而歸其仁。各竭才智著作篇章，分造辭賦，以類相從，故或稱「小山」，或稱「大山」，其義猶詩有小雅、大雅也。」「小山」之徒閔傷屈原，又怪其文昇天乘雲，役使百神，似若僊者，雖身沈沒，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章其志也。」這段話中對淮南小山招隱士題旨的解釋，後世研究者或有異議，但它在創作上學習並繼承楚辭則絕無可疑。其中對山中景物氣氛的描寫頗有山鬼遺意，至其用詞如「偃蹇」、「連蜷」、「曾波」、「猿狖」、「桂枝」、「淹留」、「啾啾」、「慌忽」、「憭栗」等等，則亦見於楚辭的其它篇章。所以，從淮南諸士僅存的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們對楚辭是多所聞見的。特別是淮南王劉安本人，還曾作過著名的離騷傳。所謂離騷傳就是對離騷的注解，由此可見，劉安及其門下之士對楚辭不僅有所掌握和學習，並且已發展到研究階段。淮南王國都在壽春，按史記楚世家，考烈王二十二年「楚東徙，都壽春，命曰郢」，所以壽春是楚國的最後一個政治文化中心。淮南王劉安在這裏發掘並傳揚楚辭，顯然是頗多有利條件的。直到宣帝時，爲了

要聽楚辭的誦讀，還必須到「九江」去徵召年老的被公，九江在漢初正是當年淮南國都壽春的所在地。由此可見，在楚國故地，尤其是曾經作爲楚國首都的地方，還是始終有楚辭流傳的。

以上兩條線索可以說是漢初重新蒐集和發掘楚辭的主要渠道，它們分別經由莊助、朱買臣和劉安等人將楚辭集中到漢廷。這一集中當然也和漢武帝「方好藝文」很有關係，所以莊助、朱買臣竟能因楚辭而得幸，而劉安也因「博辯善爲文辭」而甚受「尊重」。最高統治者如此喜愛楚辭，則有關作品的集中也就勢所必然了。司馬遷在史記屈原列傳中既摘載漁父篇中的主要事辭，又全錄懷沙全文，還在篇末讚語中說：「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可見司馬遷所讀到的屈原辭是比較多的，而這正與他在武帝時身爲史官，得觀宮廷典籍分不開的。司馬遷所轉載和提到的篇章可以視爲楚辭在史書中的正式著錄，同時也是楚辭畢竟流傳到漢代的一個小結，雖然由於讚語的體例，作者不可能完整羅列他所見到的全部篇章。

楚辭經過流傳，至西漢末年由劉向編輯成書。王逸楚辭章句離騷後序說：「後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慮，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爲十六卷。」十六卷中包括屈原辭七卷二十五篇（計有離騷一篇，九歌十一篇，天問一篇，九章九篇，遠遊一篇，卜居一篇，漁父一篇，各篇均由王逸在序中標明爲屈原所作）。另外的九卷則是：

九辯 一卷

王逸序謂宋玉所作。

招魂 一卷

王逸序謂宋玉所作。

大招一卷

王逸序謂「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

惜誓一卷

王逸序謂「不知誰所作也，或曰賈誼，疑不能明也」。

招隱士一卷

王逸序謂淮南小山所作。

七諫一卷

王逸序謂東方朔所作。

哀時命一卷

王逸序謂嚴（莊）忌所作。

九懷一卷

王逸序謂王褒所作。

九嘆一卷

王逸序謂劉向所作。

這就是劉向所編的十六卷本，其後王逸爲之作「章句」，又加進了他自己所作的一篇九思，而成十七卷本。此本一直流傳至今。

三

屈原是楚辭的開創者和最主要的作家，但屈原的事蹟却不見於先秦古籍，這在近代往往引起國內外勇於疑古者的不安，以至每隔一個時期便有人出來對屈原的存在及其辭作的可靠性表示懷疑。其實在先秦古籍中看不到屈原是絲毫不足爲奇的。中國在漢代以前，並沒有專業的文學創作者，屈原在楚國本來是以一個政治家的面目出現的。作爲政治家，屈原雖曾一度用事，但畢竟時間不長，後來便遭到貶斥、流放以至於自殺。由於屈原和楚國兩代當權的統治者有深刻尖銳的矛盾，所以必不能在楚

國史冊上占有多大的地位。何況從屈原去世到秦王朝滅楚以及統一全中國，其間不過五十多年，在秦滅六國，特別是經過焚書之後，各國的史書均已不傳。再擴大一點來看，從屈原的活動時期到司馬遷撰寫史記為止，也沒有什麼正經的歷史著作流傳下來。那麼，像屈原這樣一個政治人物，在他死後一度湮沒無聞，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然而，屈原的光輝辭作和事蹟却通過非官方的渠道流傳下來了。尤其是漢王朝建立之後，由於漢初的統治者本是楚人，不但懂楚聲，「樂楚聲」，而且從政治上說，屈原乃是抗秦張楚的先驅者，自然不再遭到排斥。而在西漢前期較為安定的社會環境中，文學創作也逐漸受到應有的重視，再加上統治階級中一些重要人物（如淮南王劉安、漢武帝劉徹等）的愛好和提倡，於是屈原的辭作得到了收集、發掘、傳佈與編訂，對屈原事蹟的傳述也多起來了。其中，賈誼、劉安、司馬遷等人對屈原及其辭作的研究，貢獻尤為突出。在漢人研究的基礎上，歷代學人又作了更為深入細緻的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這裏，我們根據前人的研究成果，並參以己見，對屈原的生平和思想略作考述。

屈原名平，出身於楚王朝的遠房宗族。關於屈原的生年，可以據之考證的唯一材料是離騷中的兩句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舊注中對此有兩種較為重要的解釋：

一種是王逸說，見楚辭章句「攝提」二句注：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庚寅，日也。……言己以太歲

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體，而生得陰陽之正中也。

「王逸的意思是「攝提」爲「攝提格」之簡稱。按「攝提格」是古代星曆學中「太歲紀年」的年名之一，這種紀年法有十二個名稱，「攝提格」乃是太歲在寅的年名。因此，這裏說「攝提」就意味着屈原生於寅年。「貞于孟陬」意思是「正當正月」。「庚寅」指庚寅日。因此「攝提」二句連在一起就是說：寅年正月的庚寅日，爲屈原降生之日。又按夏曆以寅月爲正月，那麼這二句實際上也就是說屈原生於寅年寅月寅日。

另一種是朱熹說，見楚辭辯證上：

「王逸以太歲在寅曰攝提格，遂以爲屈子生於寅年寅月寅日，得陰陽之正中。……以今考之，月日雖寅，而歲則未必寅也。蓋攝提自是星名，劉向所言「攝提失方，孟陬無紀」，而注謂「攝提之星隨斗柄以指十二辰」者也。其曰「攝提貞于孟陬」，乃謂斗柄正指寅位之月耳，非太歲在寅之名也。必爲歲名，則其下少一「格」字，而「貞于」二字亦爲衍文矣。」

朱熹的意思是「攝提」二句只說明屈原生於寅月寅日，並不說明他生於什麼年份。

這兩種說法，當以王逸說爲是。淮南子修務高誘注：「歲星在寅曰攝提。」後漢書張純傳：「攝提之歲，蒼龍甲寅。」可見「攝提格」簡稱「攝提」古有其例。又顧炎武曰知錄駁朱熹曰：「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這些材料，有的反映事實，有的講了道理，雖然數量不多，却足以助證王逸之說。

根據屈原本人提供的信息和王逸的解釋，近代學人對「太歲在寅」的具體年代作了種種考證和推

算。清人鄭漢勳 屈子生卒年月考、清人陳瑒 屈子生卒年月考、近人劉師培 古曆管窺根據「干支紀年法」推算出屈原生於公元前三四三年，即楚宣王二十七年（戊寅年）。但他們所用的方法是不對的。因為「攝提格」與「太歲在寅」等等，都是戰國時所用的「星歲紀年法」，與「干支紀年法」不是一個系統。漢以前只用干支紀日，用干支紀年始於漢代。東漢人又根據當時的「干支紀年」向上逆推，推出春秋、戰國以至更早的年頭的干支名稱。因此，歷史年表所記的戰國時代的「戊寅年」，不等於戰國時通行的「星歲紀年法」的「太歲在寅」之年。

要找出戰國時代的「太歲在寅」之年，必須按照「星歲紀年法」的系統，在後世找到一個基點，然後再往上推。郭沫若先生和浦江清先生用這個方法分別推算出屈原的生年是公元前三四〇年和公元前三三九年〔一〕。他們所用的方法正確，但結論却是錯誤的，因為這兩年都不是「太歲在寅」之年。儘管他們各自都作了考證說明，但證據仍嫌不足。所以胡念貽同志又在他們的基礎上作了新的考證〔二〕，得出的結論是：屈原生於公元前三五三年（楚宣王十七年）的正月二十三日。迄今為止，關於屈原生年的考證雖還有多種說法，但比較而言都不如胡氏之說為近是。因為從系統的觀點看，屈原的生年問題是不能孤立地加以考察的，必須與屈原生平的其他事情聯繫起來進行分析和驗證，而採用胡氏之說，則屈原的各種事蹟才能形成一個較為優化的有序結構。

〔一〕詳見郭沫若 屈原研究（一九四二年）和浦江清 屈原生年月日的推算問題（歷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一期）。
〔二〕詳見胡念貽 屈原生年新考（文史第五輯）。